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国柏林发表的演讲中提到,日本战时暴行仍历历在目。许多人提起日本侵华罪行,往往首先提到的就是“南京大屠杀”。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京大屠杀并不广为人知。

南京大屠杀为何1985年才广为人知

与内政外交政策有关

可以说,在1985年以前,并没有很多中国人知道南京大屠杀。那么为什么在1985年以后才开始宣传南京大屠杀?主要是由于中国人开始意识到牢记日本侵略的重要性,也和我国内政外交的调整有很大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日本并没有被中国政府放在眼里,“超英赶美”的目标才是关键,最主要的防范对象是“美帝苏修”。而且由于蒋介石跑到台湾苟延残喘,没被彻底消灭,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上灌输国民党蒋介石的残忍和反动。在纪念对象上,排在第一位的是被国民党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而在南京被日本屠杀的普通平民和国民党士兵则很少有人理会。比如1950年,南京雨花台建烈士陵园,毛泽东题词“死难烈士万岁”,比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设早了30多年。

那么,雨花台是什么地方?

雨花台位于南京市中华门城堡南。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

叛变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雨花台变成了国民党屠杀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的刑场。这22年中,约有近10万的共产党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革命的志士、爱国人士在此被杀害。

尽管1951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们怎么能够设想可以叫南京人民忘记1937年12月13日开始达1月之久的30万人的大屠杀?”但是这种记忆是零星的,中国开始出现了集体“缄默”,就连南京人民也未必知道。

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缅怀、纪念国民党屠杀的革命先烈成为热潮,日本战犯来南京也都被组织去雨花台给共产党员默哀。

受日本篡改历史的刺激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站了出来。南京大学历史系老师高兴祖是新中国成立期间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第一人。1960年,高兴祖等4位南京大学老师带着7名学生在南京大学及周边

的人群中进行调查。1962年,高兴祖完成了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这也是新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最早的书稿。但是直到1979年3月,才从油印本变成了白皮书,是内部出版物。

直到1982年,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对日本历次侵华战争的史实进行了多处篡改,把对中国的侵略改为“进入”,并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进行淡化或删改。在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刺激下,中国学者在申报科研课题时正式提出了对南京大屠杀进行研究。1983年,第一次提出了修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84年开始筹建,距离新中国成立35年时间。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馆,爱国主义教育焦点告别了雨花台。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深有深意地说“没有日本否定历史,就没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据《老年生活报》)

北洋水师曾有机会全歼日本海军

1882年平定朝鲜“壬午兵变”,北洋水师曾与日本海军在仁川对峙。笔者在研究资料后发现,当年如果清军情报工作更好些,完全可能轻松全歼日本舰队。

1882年7月23日,部分朝鲜军队发动兵变,朝鲜半岛一时陷入混乱,史称“壬午兵变”。日本乘机介入,调动舰队前往汉城(今韩国首尔),试图火中取栗。中国闻讯,立即调动北洋水师组成编队开赴朝鲜平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威远3舰护航,在汉城口外仁川与来犯日本舰队对峙。而日本海军计划向朝鲜水域出动的舰只分为3批:8月8日,第一艘出动的日舰“金刚号”进抵仁川港;12日,比睿、天城、磐城、清辉、日进、孟春并迅鲸号共7舰到达朝鲜外海;同时,日本海军战斗力最强的装甲舰“扶桑号”已经在品川港枕戈待命,随时准备开赴朝鲜。

这次争端的结果是清朝顺利平定兵变,这次较成功的干涉行动,史家传统认为其关键在于当时北洋舰队有两艘十分先进的战舰超勇和扬威,所以日军犹豫不敢一战。然而,笔者在日本发现的一批新材料,却给出不一样的答案——事实上日本海军1882年在朝鲜遇到了大麻烦。从朝鲜危机开始,号称1878年“亚洲最强大战列舰”的“扶桑号”便已在日本待命,但直到危机结束,也没到达仁川。文献显示,“扶桑号”未能赶到朝鲜,是因为该舰正处于伤病满船状态。让“扶桑号”动弹不得的,便是在海军史上曾令人谈虎色变的“脚气病”。这种脚气病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严重者会丧失运动能力,甚至引发心脏病危及生命。日本海军档案中有大量关于“扶桑号”舰员在此期间得脚气病进行治疗乃至死亡的记录。正因缺少这艘主力舰,仁川的日舰自认没有必胜把握,故对开打颇为犹豫。

接下来发现的文档令人触目惊心,据日本的《历史俱乐部丛书》描述:“1882年左右,海军的脚气病患者每1000人中达到400人,成为国防上大问题。”

众所周知,如果一艘军舰减员1/3,其作战能力连自卫都很勉强,如果减员一半,那么连航行都会有困难,更不要说作战了。从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可以看出,当丁汝昌率超勇、扬威与日舰对峙时,其实在那里的日本舰队已经因为脚气病丧失战斗力,各舰舰长都在忙于设法瞒过北洋水师耳目。令人扼腕的是,日军瞒天过海竟然成功了。(据环球网)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为何避战求和?

临战之际和战争之中,李鸿章和光绪皇帝是两个关联密切并可资比较的重要人物。李鸿章是清方参与决策的实力派要员;而光绪皇帝,正在“亲政”期间,是有一定“实权”的时候,在指挥战争、掌控全局方面也试图有所作为。

战争正式打响的前夕,面对日方咄咄逼人、战事似已不可避免的形势,光绪皇帝的主战态度是比较坚决的,屡催统帅淮军和北洋军队的李鸿章积极筹划,应对战事。7月16日,又通过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这样一道谕旨:

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免,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凛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从这道谕旨的口气,就可以品出光绪皇帝对李鸿章的督责之切和他战备不力、“徒事延宕”的不满。的确,李鸿章是实在不希望打起仗来。要说,在战前可能的条件下,就清朝方面而言,尽量争取化解矛盾、避免战争是应该的。但日本方面并不答应。随后,李鸿章又倾向于清朝单方面从朝鲜撤军,但光绪皇帝明确否定,在给李鸿章的谕旨中说:“彼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嫌示弱,且将来进剿,徒劳往返,属殊非计。”问题是若实行清朝单方面撤军是否可取。有资深的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如果中国在双方撤军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宣布根据朝鲜政府的要求而单方面撤军,

未始不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因为日本当时已经在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中国军队一旦撤离朝境,那末,它不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而且想把清军拖住的阴谋必然破产……所以,在此阶段中,李鸿章保全和局的想法不见得全错。”当然,同时也指出了他认识上的缺陷:“问题是他未能洞察奸谋,及早采取相应的策略。”

对于以牙还牙地抗御日本方面来说,光绪皇帝的态度似乎比李鸿章要坚决和特正。并且,日本方面是蓄意借机激化矛盾制造衅端者,公理和正义绝对是在中国方面。这一点,连有的外国人士也不否认,但是又认为仅仅靠此不行。像英国人赫德就这样指出:日本是根本没有正义可言的,正义完全在中国方面。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单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饭那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根筷子——实力。但是,中国人却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实际上,不光是“老道”的李鸿章,即使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决不是这般天真之辈。他不可能不掂量自己国家的实力,特别是军队和武备情况。在战争爆发前的7月初,他就急切追问李鸿章所统海陆军的详细情况:“究竟海军新练之兵共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李鸿章在复奏中报告:

北洋现有镇远、定远铁甲两艘,济远、致远、靖远、轻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

此外超勇、扬威两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系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如战舰所配员弁,机轮、枪炮各有专司。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动,战舰过少。

沿海陆军,除胶州台工经始未成外,山东威海卫则绥巩军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四川提镇宋庆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仁字两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谓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两万人者指此。其分驻天津青县之盛军马步十六营,军粮城之铭军马队两营,皆填扎后路,以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至于绿营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国藩及臣创办练军,渐收实用。无如直隶地面辽阔,与东、奉、晋、豫接壤,北界多伦、围场,皆盗贼出没之区,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远役。

这是李鸿章就自己所辖北洋区域内的武力家底,开列给皇帝的一份详明“菜单”。我们原原本本地把它列在这里,对甲午战争中清朝作为主力投入的北洋部队,也就亮出了一个大致底数。再就是,从李鸿章的奏陈中也能体察出,他申说以北洋武力应战捉襟见肘的意思。这也是他从一开始就以避战求和为主导倾向的重要根源所在。

(据环球网)